

網絡言說與現代性精神

◎ 吳勵生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仍然在拒絕上網。

是伊拉克戰爭改變了我。

我想，這其中當然有著現實而深刻的原因：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特別痛恨我們國產的「中體西用」說，甚麼東西好用拿過來就用，從來就不問這好東西是怎麼來的！西方由宗教而哲學而科學，從根本上是來自一種精神，也便是這樣一種精神發展出了無比豐富的現實世界。我們呢？從來就只懂得實用，怎麼也不願意去發展這樣一種精神，所以我們的現實世界總是顯得那麼貧乏。假如一定要說有這麼一種精神，那就是文人的精神了，安貧樂道，寄情山水，特別瞧不起物質世界。據說這種生活還很高級，梁漱溟先生就有過這方面的高論，說東方人成熟過早，一開始就過上了高級生活——心靈生活，卻忽視了發展比較低級的物質生活，你看看西方低級生活發展得夠豐富了，現在要開始發展高級生活了。這種階段論或者進化論的說法，有多少說服力且不去管它。心靈的東西肯定不能跟物質的東西有如此嚴格的劃分，換句話說，實際上心靈是由物質世界的構成而構成的，有著甚麼樣的世界觀就將必然構成怎樣的心靈，反過來也是：有著甚麼樣的心靈，他的對世界的理解就必然要受其影響和制約。比如說吧，就是現在，我們還有多少人在那輕物質而重精神哪，把現代化的物質浪潮視為洪水猛獸，人文精神受到多麼嚴重的威脅云云，我們實在耳熟能詳。因此我老是以為中國人的精神必須重新改造，否則你拿來再先進的東西來用，用也就是用，「體」還是那個「體」，至終還只能是原地踏步，根本無能進步。

比如直到現在，仍然有人在那研究網絡說，我們應該怎樣利用網絡的功能，進行後現代文學（網絡小說）的創造了。你看看網絡有多少功能啊？那就叫做多媒體的功能了。並聲稱，傳統作家把他們的作品貼上網，這不是網絡小說，是對網絡的不了解，是跟不上趟的表現。時髦也時髦，後現代也後現代了，但究其根本，卻是丟失了自身的確切身份，模糊了自身確切的邏輯認知：無思無我無聊無行，那些個東東，我們實在耳熟能詳。也便是基於此，我們已有不少人醒悟到了這一點：中國的思想，——失敗了！

回到我自己的問題上來：伊拉克戰爭打響，一場蟻象之仗，一場模型化、類象化、符碼化、資訊化戰爭觀看了下來，我簡直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們的先人當年決定一定要好好學習西方的直接動機是不是大致也這樣，但我知道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所遭遇的卻基本是失敗。但不管怎樣，我再也不能對互聯網漫不經心了。我們都很清楚，這個互聯網當年只局限於美國國防部的科研範圍，而今能在民間推廣，實在是美國軍方以為地方上再怎麼發展也跟不上軍方的技術的了，於是互聯網技術在世界上的各個領域迅速蔓延開來，資訊管理與發展推動著世界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掀起過一個又一個的浪潮，其中：當然也包括文學和藝術的發展……哎呀，我的媽呀！說著說著，矛頭可就得轉過來對準自己了！但，老天作證：這可不

能賴我，所謂君子動口不動手，我們祖上就這麼傳下來幾千年了，你說我不懂電腦不懂互聯網不懂……這不是很正常嗎？就這麼自怨自艾還忘不了給自己找個台階下，然後怯生生地還有那麼點誠惶誠恐地開始學上網……

沒上幾天網，我就跟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天哪，網上真熱鬧啊？！在國內就已經有了那麼多的文學網，有團體的，有個人的，有公家的，有私人的，還真的讓我有點眼花繚亂了起來。同時我還看到了那麼多的理論網，我的老天爺，這些理論網比那些官辦的雜誌真不知道強去了多少倍，尤其是《法律思想網》、《犀銳文化藝術》、《世紀中國》，還有《學說連線》《學術批評網》《公法評論》……等等，我整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就盯著螢幕，以至盯得我視力都下降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就認識了一個年輕人。由於是在網上，剛開始肯定帶有點虛擬的成分，但我又分明地感到著幾分實在：因為這個經營著一家文學網站的年輕人顯然供職于公安系統，或者顯然跟「公安的」有點沾邊，倒不是說「公安的」就真的讓人感到牢靠，原因在於本人曾經長期供職於公安系統，所以一見著就覺得親切、眼熟，要不他怎麼就會想著開辦著個「福爾摩斯探案推理」的欄目呢？於是就想著打打招呼。這麼一打招呼，我就跟國內的第一家跟我有關係的文學網《華夏文學庫》建立起了聯繫。站長叫張舒智，非常熱情，非常樸實的一個年輕人，他非常歡迎我。這讓我格外高興。而慢慢地，也確實驗證了我的預感：張舒智先生確實在公安系統供職，而且可能就是跟我原來一樣搞的是公安宣傳工作。於是，我在網上正式展開文學活動和理論活動就算正式開始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卻一開始就真真切切地感受著「作家是被閱讀而存在的」這麼一個經典命題。我以前在眾多的傳統紙媒體上發表過近200萬字作品，我實在不知道究竟有幾個讀者在讀我的東西，我只知道我曾經在辦的一個公安文學刊物發行量原為20幾萬份，然後逐年遞減，就剩下幾萬份，就……最後停辦了。我的一個30萬字的長篇小說《靈魂點擊推理》開始在《華夏文學庫》連載（之後由中文在線做成電子圖書，點擊量居然達近30,000次），讀者與日俱增，這跟往日傳統媒體的間接閱讀不同，我可以在網上直接了解到有多少讀者在讀我的東西（後來我在網上搜索到《亦凡公益圖書館》2001年8月份轉發我的一部原被收入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偵探與推理》一書中的中篇小說《蛛絲馬跡》，點擊量居然達到近30萬次，之後又發現由該網站往外輻射，有20多家網站轉載了該部中篇，甚至包括台灣的《身心障礙圖書館》網站），這個閱讀刺激便是十分直接的了。

因為我是作家出身，剛開始上網尤其是理論網，大多時候是瀏覽，是掌握資訊，比如《世紀中國》、《法律思想網》、《學術批評網》等，並沒有多少參與意識。但，當我反復接觸了《犀銳文化藝術》，就開始有點按耐不住，就開始摩拳擦掌了。既是出於本能，也是出於自覺。當然，說到底：這個本能是表達的願望，這個自覺仍然還是參與的意識。

屈指算來：從我的第一篇文章《韓少功兩部長篇小說批評》（首發《犀銳文化藝術》網）2003年11月8日正式上網至今，前後才半年多，我居然已經有百萬字的東西在網上撒播著了。網絡給我深刻的感受是，能夠不斷地感受到讀者的閱讀刺激。《犀銳文化藝術》也一樣，我同樣能夠在三天兩頭之中檢測到文章的閱讀次數。我在《犀銳文化藝術》發表的大多數文章，都是不出幾天便是上百次的點擊量。

就是這種閱讀刺激給我帶來了從未有過的那麼一種興奮。興奮之餘，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要邀請一些朋友的文章共同上網，不曾想，好幾個朋友的回答是不大熱心，說網上太鬧，無序，太衝浪……或者太寫手、太網絡、太QQ……

想想這些朋友也真是好玩：面對舊體制的種種腐敗，其也時時能夠感受到一種生命的破碎，

感受到一種精神的裂傷，時時也想著尋找一種個體表達的權利，然而，即便是這種破碎、裂傷、權利，其也寧可面對舊體制舊秩序自怨自艾，哪怕誰都知道那些個刊物大都是只有少數幾個人在那兒操刀，要不拉幫結派，要不互惠互利，實際上基本是拿著公家的工具幹的假公濟私的自己的事情，你若硬要往上湊那你就得隨時準備著一個個地隨時準備著剃你的頭，遺憾的是：儘管有俗語雲「剃人頭者被人剃」，但是，哪怕是頭都被人人剃了，他也還是不肯去剃別人的頭，要不然作品拿到哪里去發啊？哪怕那發出作品的刊物發行只有幾百份，他也要感到一種心理上的踏實和充實，畢竟是鐵飯碗好啊，稿費千字30元那也是稿費啊。儘管，文化產業化勢在必行，舊體制腐朽的文學和腐敗的學術必將消亡，可歎的只是：哪怕摧枯拉朽著，還是有著不少的朋友不願意參與到新體制的建設中來，哪怕他早已是個無奈的逍遙人，並早已逍遙在把玩「紫砂茶壺」的消遣上了……

我卻義無反顧，並願意用我的真誠也願意用我的努力，繼續堅定認真地去做好這一件事情，並儘量努力地去實踐著豐富著這一件事情。《犀銳文化藝術》網站停辦後，我帶著我的一幫好朋友，開始移師《學說連線》，我的這些朋友一個是一個，牛皮絕對不是吹的，全是擲地有聲的主兒！緊跟著，我的這些朋友便在《學說連線》建起了一個又一個的專集，也就讓我跟該著名學術網站的主持人沈中先生的合作初具規模了起來。同時，著名文學網站《文學視界》的宇慧女士也跟我有了合作，在她的「名家雲集」欄裡收入了我的個人專輯，我的這個專輯中不僅收進了我自以為得意的一部長篇小說，還有幾篇自以為能代表自己當下的批評理論水平的而且篇幅較大的批評文字。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能夠取得這麼好的成績，不僅讓我深深感受到網絡傳播的神奇與神速，感受到第四媒體的影響和威力，以及可以預測的輝煌前景與難以估量的網絡世界的可能性……

那麼，還是讓我的朋友們——更多的朋友們：在我們的生命不時地面臨破碎的時候，在精神不時地面臨裂傷的時候，在我們尋求個體表達的權利的時候，讓我們勇敢一些，再勇敢一些，讓我們自己——只有我們自己讓自己，慢慢地開始美麗一些起來吧！

當然，以我自身的短暫而特殊的網上經歷，以上所述僅僅是一些感受而已。

在這些感受之外，顯然有諸多的相關性問題格外發人深思。

一 網絡與個人主義訓練場所

眾所周知，我們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化傳統，只能亂動不能亂說早已成了我們不言自明的行為方式：你儘管亂動，但說就一定要說一些場面的話、漂亮的話、冠冕堂皇的話，也即特別符合體統的話，哪怕再大再空再假，沒有人會感到不習慣，沒有人會覺得不正常，你不信，只要你在公開場合，你就會自覺不自覺地也跟著這麼說跟著這麼想跟著這麼做；不是公開場合呢，你就可以亂動了，你想幹甚麼就幹甚麼，而且你手中的權力越大，你的膽子也就越大，你亂幹的可能性也越大。君不見我們的腐敗已經滲透到幾乎所有的領域，連文學都可以腐敗，連學術都可以腐敗，還有甚麼不可以腐敗的呢？我們肯定不能天真地以為是金錢讓人腐敗，我們當然清楚極端的權力是導致我們腐敗的真正根源。此其一。其二，更有大面積的在舊體制中升降浮沈的人、左右逢源的人、爭當牆頭草的人，因為利益只有一元選擇，絕無多元可能，事關車子、票子和房子等等，互相傾軋互設障礙，指鹿為馬，不辨是非，也就成了必然。除了生存被控制，就是意志被控制，然後除了那雙眼睛間或一輪還能表示其是個活物外，基本缺失個體思考的能力，當然也就很少感覺到個體言說的必要。即便是搞文學創

作，當然就在於是否在一些比較「大型正規」的刊物發些東西，這不僅能夠給他（她）帶來「名聲」，更能給他（她）帶來好處，至於那些個東西究竟是甚麼東西，則是無需太多關心的。至於做學術，「核心期刊」自然是第一選擇，要不然評職稱怎麼辦啊？寫不出來就抄，發不出來就買版面，於是就有配套工程出現，就給那些掌管著文學機構學術機構的手中有些「權力」的人，創造了種種腐敗的溫床。還不僅僅如此，在這眾多的文學機構學術機構呆的時間長了，反而會把這種腐敗視為正途乃至正宗，假如你不懂得腐敗，假如你拒絕腐敗，假如你還要傻得不透氣地指出其腐敗，那你不但在眾人眼裡屬於不正常，而且簡直是有病！因此，對那些本來就該人人都應該重視的個體表達權利，倒是極正常地被名正言順地摺在一邊。這樣，自從網絡上出現「寫手」一說，就自然帶上了鄙夷的色彩，對民間對邊緣就自覺不自覺地有了一種中心的感覺，哪怕在（權力）「中心」裏面其是多麼的微不足道，多麼的慘不忍睹，但一旦有了這種感覺，起碼還能給自己找到那麼一點點自慰和心理平衡，中國人，尤其是中國文人病重了矣！

平心而論，我也佔了不少舊體制的便宜，光是稿費（稅後）我就拿過有10萬元人民幣多一點，在全國各類報刊發出的文字就有近200萬字，似乎我並沒有太多理由抨擊舊體制而去歡呼甚麼新體制。然而，恰恰相反，就是因為有著無比痛切而切身的舊體制經歷，我才無比堅決地走上了自由作家、自由學者的道路。舊體制的所有經歷我歷歷在目：除了我自己曾經長期供職的《警壇風雲》發出的6部中篇和我的帶有根據地性質的《滇池》雜誌發出的4部中篇、5篇理論文字以及《當代作家評論》的一篇文學評論，其面貌相對完整，其他所有的無論是小說還是理論文字發出來的均是面目全非。按說我是《文藝報》的老作者了，可在他們那發出的文字，無論是我寫別人的還是別人寫我的，十多篇文章中沒有一篇是完整的，支離破碎，缺胳膊短腿，不僅讓人難以卒讀，而且讓人目不忍睹。即便是那些地市級報刊，有的編輯甚至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因為覺得自己是編輯，不編一編，刪改刪改，就體現不出編輯水平似的，儘管其語法、邏輯知識一塌糊塗，大概除了能寫幾首不太講究語法更不講邏輯的詩歌，就以為自己的文字能力相當可以了，於是管三七二十一先下手為強，不改個亂七八糟前言不搭後語決不善罷甘休！嗚呼，悲哉！且不說如何愛護藝術創造的個性如何愛護學術思想的獨立性，就是如此肆意踐踏一個人的個體表達權利，就著實讓人忍無可忍！我們的個體性生成是如何被屢屢槍斃在萌芽之中，又是如何在人為編織的重重羅網之中，如何在無比險惡的人文環境當中夭折，根本就不能也無法得以生成！

更為嚴重的是，一脈相承，這樣的人文環境和相應的文化制度，必然就派生了更加惡劣的文學生態和學術生態環境。眾所周知，我們的學術缺乏正當公正的學術評價，我們的文學更加缺乏正常健康的文學評價。於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勝者為王敗者寇，拉關係，開後門，拿著公家的工具做交易，甚至有的不惜出賣肉體，發出些篇東西出了本書，如法炮製或者乾脆花錢雇槍手（評論家）寫評論，如法炮製去得個甚麼破獎，然後就可以作為提拔的依據作為評職稱的依據。更不用說占著公家碼頭的人，幹起上述事情來，更加得心應手，更加臉不紅心不跳！要不就聚集在「碼頭」周圍，輪流坐莊，分攤買賣，不辨是非就為投桃報李，分得一杯半盞的殘羹剩飯，即便是殘羹剩飯也會啃得無比幸福！我們的文學和我們的學術已經腐敗腐爛到了臭不可聞的地步。

因此，我特別欣賞《千秋文學網》的一幫年輕人樹立在「民間陣營」通欄的口號：「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後名；民間有一股英雄氣，在馳騁縱橫；你們不給我位置，我們坐我們自己的位置；你們不給我們歷史，我們寫自己的歷史……」是啊，與其動不動就被大卸八塊，只要佔著個甚麼位置隨時隨地就可以把你的頭來剃——假如剃光了成了光頭，倒是更顯個性，另

當別論；大多情況卻都是變成了陰陽頭，陰陽怪氣，不辨所以；還暫且不論意識形態話語如何滲透的種種思想控制與文化管制，光是陰陽五行的種種話語就能讓你喘不過氣來。外加種種的現實限制，諸如地域限制：每個地區的刊物首先考慮的是本地的作者，而且每個刊物幾乎都有自己的嗜好（又是不論常常還有抱團、小圈子之類，審美趣味學術趣味極其狹窄，如果是私人的、同仁的刊物另當別論，卻偏偏又全部都是公家的），然後就按他們的這個嗜好要求你的文稿。在這方面我的體會與感受也深。除了在面上發出的近200萬字作品，起碼有5家以上的被「碼頭中人」看成是「大刊物」（所謂「大且小且」中的「大且」之類）「皇家出版社」之類向我約過稿，大多時候是因為我我行我素，全然不予理會人家的特別嗜好，自己覺得怎麼好就怎麼寫，而且基本拒絕修改，就可以想象了：我跟他們常常打的都是擦邊球！因此，看到《千秋文學網》的那一幫年輕人，我真的是好生羨慕，真真是感覺到痛快，感覺到那種「上下通氣不咳嗽」的那種痛快！

然後又看到《紅袖添香》、《紅葉輕揚》還有《東方文學網》等等，在那活躍著的眾多「網絡寫手」中，講求的無不是每個個體的自由表達：這些人有的在傳統媒體發過作品，有的沒有發過，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份輕鬆愜意，根本就用不著去看誰的臉色（對那些狗屁不是卻又佔著某個公家的刊物、出版社的編輯位置的人五人六的嘴臉，我們實在是看得夠多的了！），朋友也天南地北，彼此常常連面都沒有見過，只要註冊了，只要有點共同語言了，就可以「嗨」地隨意打招呼，然後大家完全平等地交談、交流、交往……而全然沒有彼此爭奪話語權的欲望和嫌疑，這是一種很好的文學精神的培養；更不是被計劃的文學，被控制的文學，你只能表達甚麼你不能那樣表達等等，更不用說在舊體制裏面刨食需要爾虞我詐，尤其需要詩外的功夫，一旦獲得話語權就可以信口雌黃，根本就不必也無須關心文學為何物，關心的只是如何限制別人的話語表達，把別人限制住了，剩下的我就是「老大」了！文學的東西只有讓它自由生長，讓它自我訓練，讓它自我培養，才可能形成真正的文學，因為：在任何時候，文學只能是個人的事情，而絕不可以也不可能是被組織起來的事業，更不應該是政府可計劃可包辦的行當，否則，結果就是我們現在滿目所見的所有文學機構和文學組織，基本上就是那麼幾個人打著大大小小的公家旗號，假公濟私，為小集團服務而已，形同虛設不說，對文學本身只能有百害而無一利！說白了，文學缺乏了自由生長的環境和制度保證，優勝劣汰的客觀規律就是遭歪曲甚至是扭曲著的，這樣我們優秀的藝術和優秀的藝術家從來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就是很正常的了。

網絡提供了這種可能，首先網絡可以保證發出各自不同的聲音，尤其是個體的聲音，這一點對文學精神的造就來說形同關鍵。文學需要討論，需要爭論，更需要不同的聲音，假如連作家協會主席都是「鼓掌通過」的文學只能是對文學的徹底強姦，更不用說對文學必須要有真正健康的批評機制，否則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學。說白了，官本位的問題一天不解決，我們本土的真正現代性便一天也不可以發生。我們的現當代文學就如同我們現當代的思想一樣，所遭遇的就只有失敗，別無他途！發出不同的聲音，不僅是個體性的要求，更是現代性的要求。

其次網絡是個自我表現的最佳場所，同時也是個人主義的最佳訓練場所，在官本位的官場化文化裏面是不可能有個體性的存身之地的，能夠盛行的只有自我主義了，因為我們的社會體制與社會意識支援的就是這個東西，正面評價的也是這個東西，那麼不擇手段地去獲取這個東西就是相當正常了，否則就是「傻B」了！只有在轉型的社會機制裏面，只有在市場本位、個人本位裏面，我們才能夠真正感受到天賦人權彼此平等，我們才能夠真正懂得去尊重別人，我們才會真正地去尊重別人的勞動和創造，否則：精神壓制與壓抑的結果，只能讓我們

的生存品質越來越敗壞。於是木子美（據說原名叫李麗？）現象等等絕對不足為怪，如果不予以宣泄，精神只有崩潰！就像排泄有益於身心健康的道理一樣。因此我們看到眾多的「社區」都設有「灌水區」——「灌水」者，「短路」也！延伸了後，就自然變成了「缺水」——大家猛灌啊！仍然是一種宣泄，就可以避免更加慘重的精神裂傷，哪怕是泄憤，至少對心理能量的釋放大有益處。更不用說從審美主義現代性的意義上說，生命的衝動與解放，精神的有意墮落與放逐，乾脆就是對本質主義的強權話語進行顛覆和反諷的必要手段。而且在這裡從事文學寫作的不少人，大多只是為了好玩、有趣，並無功利之心，他們有的說法都算得上精彩：他們說文學當然可以表現痛苦、描述苦難，但文學決不能把自己搞得很痛苦；一個人一不小心可能弄出幾個轟動的作品，但並不表明他就能成為一個作家，一個真正的作家需要很多很多的東西養成……說的不僅辯證，而且堪稱中的之語。更有《黑藍文學網》的一撥年輕人，全力主張純粹的藝術純粹的寫作，儘管真正純粹意義上的寫作是不可能的：他們不僅要面對早已存在的世界藝術經驗（比如法國新小說以及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的敘述學理論，等等），而且還得面對我們自身的非常特殊的寫作言說語境（比如甚麼是民間的，甚麼是知識份子的？等等）。即便純粹寫作僅僅是個努力方向，首先也要面對我們本土的種種無法純粹的大現實……但，網絡多少為他們提供了這種可能，寫作指向了寫作本身，而不是指向寫作之外的東西，比如實用的東西（金錢、榮譽以及其他晉身之階梯等等）。而便是這，恰恰是本土特別稀缺的資源了。

網絡提供了真正同仁意義上的民間精神。面對舊體制的民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間，充其量只是市井流傳而已。民間的最根本意義在於團體意識，沒有團體意識，同仁的說法就要大打折扣了。網絡提供了這種轉型的可能。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形成的知識生產和文學生產的控制和壟斷，生產、流通、消費的一體化導致了知識和文學的長期貧困，更導致了人們的思想選擇與個體選擇的單一化、固化甚至板結化，更不用說利益的單一化、固化與板結化。人們沒有更多選擇的可能，幾乎全部擠壓在一條獨木橋上，加上人性的醜陋與惡劣，最終導致的窩裡鬥爾虞我詐惡性泛濫的極端敗壞的生存品質，只能說就是必然結果了。那麼，轉型就是個無比重要的契機，文學生產就必須從官場化的泥潭中掙脫並斷裂出來，走上市場化的道路，知識生產就必須從計劃舊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走上職業化的道路，我們才能夠杜絕群眾團體衙門化（比如作家協會）、知識群體計劃化（比如高樓大廈的大學而並非大師的大學），我們長此以往的文學生產與知識生產的統購統銷，養下了不知多少的文學懶漢和知識懶漢，而且這些懶漢們還回頭為獎懶罰勤創造了多少不可思議的肥沃的土壤！從而也給勤奮者設置下多少障礙！還不僅僅如此，網絡的出現似乎還給日益險惡的人文環境提供了某種喘息的機會，著名文學網站《文學視界》的宇慧女士的一段話，便直白傳達了對網絡的這種感受以及對文學的看法：「後來，我開始在網上行走，到處去看熱鬧，從一個鏈結，跳進另一個鏈結。我先是給它迷惑了。有那麼多人，在一幅幅的文字下，因為沒有面孔，所以它們似乎顯得更加真誠。而在這之前，我早已開始為鉛印的文字中的虛偽矯飾而厭倦了。只要人一想到自己身處那張社會網，想到身邊的朋友與同事，就禁不住要戴上面具。而我則一向認為，只有真實的東西，才是有力度的——不是客觀的真實，是心靈的真實。我發覺網絡（至少許多人心目中的網絡）給人提供了一種安全感，於是他們重新變成了赤裸的人，大聲說，大聲笑，大聲罵人，他們在BBS上亂貼，沙一樣的文章到處都是，但這其中有能令你感動的東西——寂寞的心，在這裡喃喃自語。」（《我的世界》，見《文學視界》「站長專欄」）在此基礎上，我想對宇慧女士的精彩說法作一些補充：就在這沙一樣的文章當中，可能會漸漸大浪淘沙出金子。就如同當年鉛字印刷的出現，大多擁有印刷廠的人便同時是寫作的人，便是在這些人當中出現了不少大作家，最典型者如巴爾扎克；之後又有諸多經營報紙的人同時便是寫作的人，也出現了大作家，比如金庸；更有這個世界上不知多少當記者出身的專欄作

家，呼風喚雨，生產了多少有過廣泛影響的文學作品……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常常搞錯了「文學作品要經得起時間檢驗」說法的重要前提，這個前提便是民間，只有也唯有民間，時間才是有意義的，任何體制化的檢驗都將是虛妄的，不是幾年，也不是幾十年……在那舊有的體制化的文學當中，所謂獲獎所謂研討會所謂種種的不亦樂乎等等，幾乎是一轉身就全成了精神垃圾。文學只有回到文學本身，思想只有回到思想本身，知識只有回到知識本身，文學才是有希望的，思想才是可能的，知識才可能得以真正發展。因此，完成新舊體制的轉型就是關鍵中的關鍵，儘管這個轉型是無比艱難的，君不見我們的改革狀況幾乎均是進一步退五步？舊體制的反彈力量實在驚人，有時幾乎是到了做垂死掙扎的負隅頑抗的程度。

那麼，我們本土現代性的前提，唯有個體性的覺醒，覺醒的個體只有在不斷地為自身去蔽的過程當中，慢慢去建立豐富並完善的個體性。那麼，網絡就為這個劃時代的轉型提供了一個相當重要的空間，顯然也為眾多的青年人反文學控制反知識控制提供了可能。

二 網絡是個真正的公共空間

我們知道，言說自由、思想自由的空間，首先來自經濟自由。但是，顯然也有不少人不同意承認這一點。比如就有某名作家說，別看誰誰誰批判這批判那，實際上只不過是被逐「出局」的問題，其實其思維方式是完全一樣的，云云；更有為數不少的激揚文字者，更是一番書生意氣，所謂「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無論是前者抑或後者，說法與行為都大成問題。前者所指的是「出局」而不肯指向「局」本身，純粹是抓了芝麻又丟了西瓜，假如我們這個社會既不能選擇當官員也不能選擇當學者，既不能隨便開文化公司更不能染指出版以及媒體……等等，也就是說，這個社會不可能給你以選擇的自由，即便你有著怎樣的創造力怎樣的能力怎樣的三頭六臂，也是無濟於事——劣幣驅逐良幣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哪里要是存在良幣驅逐劣幣的現象，反而是極不正常的了。因為我們的這個社會仍然處在傳統社會非常緩慢地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當中，我們的這個社會仍然是家族社會、身份社會，是一個限制個人選擇的不自由的社會。因此，這個「局」對於作家或者文人來說，意義還是相當大的，這些人往往特別自我中心，特別有一種「明星」的欲望，假如那個「局」裡沒有他的位置，他照樣還是可以跑到「民間」裡去找到「中心」的感覺的。至於公共意識從來淡漠，公共空間更不知為何物。現在我們已經非常清楚，不管是蔣介石時代還是前毛時代與後毛時代，我們時至今日不能走出傳統社會的陰影而真正進入現代社會的廣闊天地。那麼，我們顯然有必要簡單認識一下：何為傳統社會？又何為現代社會？根據社會學家們提供的簡單定義：自然經濟的、封建血緣的、官僚權威的、缺乏社會福利的、鄉村性的、機械團結的、農業的、信仰思維流行的、一元化的等等社會形態屬性，便為傳統社會。而具備有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化的、福利主義的、城市化的、有機團結的、工商業的、科學思維流行的、多元化的等等社會形態屬性，則為現代社會。兩相對照，我們大致可以簡單明瞭地分辨出我們眼下的這個轉型社會，有多少的艱難與艱巨性任務擺在我們的國人面前。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明白是經濟轉型這個關鍵促成了其他方面的轉型；也儘管如此，我們仍能看到絕大多數借著經濟轉型乘機大撈一把，卻是絕對拒絕其他方面的轉型，比如上述的「出局」一說。問題在於這個「局」又是甚麼呢？這個局就是廟堂，所謂「身在民間，心在廟堂」的那個「廟堂」，因此民間如何民間又是甚麼是大可以不用操心的，一轉身他就可以不在民間也絕不願意停留在民間，因此民間就成了個莫名其妙甚至壓根兒就不能存在的東西了。那些激揚文字者，自五四以來我們本土就特別盛產，思想批判、文化批判特別熱衷，經濟自由與經濟利益卻是絕對羞於啟齒，除了士大夫情結（所謂士不理財，君子不言及利等等）更有經

濟的事業不夠崇高，只有文化的事業才夠神聖，因此直至今日還有不少人在那做夷夏之辨，中西哲學與文化如何如何不同，所以才如何如何等等。且不說中國思想自晚清民國以來便是這樣完全失敗了的（成了西方的子學），也暫不論此前所有的思想批判與文化批判最後均被不同的政客們所全部利用了，就說我們早已知道了的西方如何如何，我們自己如何如何，問題是我們自己究竟怎麼辦？

只要你不斷地重新面對我們這塊災難深重的土地時，你就會不時地感到我們又有多少的無從談起又有不知多少的積重難返！即便是從自由上說，光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而不顧及經濟自由，這個自由就是跛腳的；另外，這個自由不是實踐的自由而僅僅只是建構的自由，這個自由從根本上說就是虛假的。更有新左派們對自由主義者們的攻擊，聲稱「驅逐權力，推翻專制」等等是幼稚的自由主義，「在貪官污吏撈足了油水，並實際控制了主要經濟資源的情況下，不過是為非法暴富階級扔掉礙手礙腳的外套，名正言順地轉入金權政治運作模式，創造條件」，其最大的依據是：今日俄羅斯。（儘管中國不是俄羅斯也不太可能是俄羅斯，中國的改革之所以還有活力，原因便在於還不至於到了當年蔣家王朝的寡頭與黑金的程度，也就是說把佔有資源轉換為金錢是腐敗的根源，而想把金錢轉換為權力，中國顯然缺乏這個傳統：要不然你就無法解釋中國人的財富常常是一筆又一筆的無用的財富，其中包括遍佈全世界的海外華人）他們的主張是：「吸取文革的正反兩方面深刻經驗教訓，採取精心設計的程式和制度，讓人民真正擁有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和權利，把中共各級權力牢牢置於由群眾監督和獨立新聞媒介所組成的嚴密監控系統之下，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應該說，願望都是不錯的，可是幾乎沒有一條可以落實。所謂人民當家作主，從來就是奴役人民的藉口，所謂民主從來都是「你是民我是主」，我可以代表你做主，所謂「為民做主」是也。這麼個東東而今還要拿出來騙人？沒有一點說服力了！我只知道，2003年的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民權運動」，搖旗吶喊大聲疾呼並為之努力奮鬥的，除去「書齋裡的革命」的一些人，完全就是一批自由主義者，根本就見不到聲稱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左派們的丁點蹤跡。更不用說關心程式公正與制度設計的，更是那些酷愛自由的學人，新左派們關心的是西方的這個大家那個大家的西方理論如何如何，哪里關心我們作為老百姓自己究竟有多少權利應該受到維護和尊重？更不用說甚麼「監督」甚麼「獨立」的「新聞媒介」，簡直近乎癡人說夢！而始終不遺餘力地關心程式公正與制度設計的，也恰恰是一大撥子中道自由主義者，新左派們更是漠不關心。

我們知道，假如不是這個大時代給人們帶來相應的經濟自由，所謂自由作家、自由學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者的出現，從根本說就是不可能的。也恰是由於這些自由主義者的出現，不僅及時補上了古典自由主義理論這非常重要而又形同關鍵的一課，同時也是他們發現了公共領域對我們的無比重要性。假如我們的教育、醫療、科研、文娛、體育等事業單位聚集著的是大量的吃財政飯的混飯吃的大多數，更不用說財政飯吃到我們八億農民的骨髓都快被吸幹了的鄉鎮政府的耳聽八方眼觀六路嘴吃四處，我們的政府機構哪一地哪一處不是個個大小衙門？這裡充斥的是整天坐在辦公室裡瞎指揮、發號施令的公共管理人員，你敢指望他們到街頭和社區去巡邏，到市場和礦山去檢查，到馬路上去執勤，到農村、學校和醫院去傾聽社情民意？他們所聽到所看到的當然是通過層層包裝的弄虛作假的鶯歌燕舞。我們從來缺乏服務於第一線的隨時直接面對基層普通民眾的公共服務人員。為人民服務，從來只是口號，假如已經落實在行動中了，口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和理由。不是嗎？不接受人民監督，服務從何談起？人民如何監督？只有靠輿論監督。然而，我們的傳統媒體，眾所周知是「喉舌」，即便有監督也是「左手監督右手」一轉身就自己跟自己握上手了，談何監督？只有到了第四媒體——網絡的出現，輿論與監督才真正出現了重大轉機。最典型的前有孫志剛

案件後有湖南女教師「黃靜裸死案件」，兩個「網上紀念館」影響巨大，參與的網民均為數十萬上百萬名之巨，然後都有效地改變了案件的偵查方向以及定性。尤其是「黃靜裸死案件」，至今餘音嫋嫋：從案件的錯誤判斷到定性錯誤到重新鑒定到重新定性，直到現在的問責，案件偵查過程重播以及案情推理結論的進一步可靠性，等等，都在全方位的人民輿論監督之下。稍有閃失或者不負責任的行為，都將是對人民的犯罪。我們整天講公正與正義，沒有人民的監督就不可能有公正，用黃靜母親的話說：「如果沒有網絡，黃靜的案子肯定是另一個樣子。」（參見《野草先鋒網》）沒有正義的運送正義的方式，那麼這個「正義」就要大打折扣，當然，這是另一個問題，即：誰來監督監督者？當然，這已是法學意義上的問題了。

我關心的是，我們只有通過我們本土的實例才能讓我們明白甚麼才叫做輿論監督，甚麼才叫公正。那麼，我們也就能夠清楚，當今中國，網絡，也只有網絡才是一個真正的公共空間。

當然，恰恰是個公共空間，林子大就甚麼鳥也都有了。如前所述，泄憤的吐痰的更不用說灌水的，極度情緒化的東西鋪天蓋地，比如而今の腐敗已經到了人人痛恨的地步，卻又有眾多的人等不去反思導致我們社會的種種腐敗根源，反而滿懷深情地去懷念毛澤東時代，甚而至之對文化大革命那個世紀大災難充滿溢美之詞，聲稱其是「清算資產階級法權」「杜絕修正主義」的最有效辦法（參見《中華復興網》的些篇文章）等等，完全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陳詞濫調的重新泛濫，恨不得讓我們的時光繼續倒退三十年！讓人喪氣的是，我們總是喜歡簡單劃一（一元）的生活，總是喜歡共同貧困的生活，總是喜歡均貧富的理想，總是喜歡劣幣驅逐良幣的生存方式，我們的現代化腳步也就因此總是顯得那樣地舉步維艱。當然，既然是公共空間，我們就應該培養一種寬容、理性也即平和、講理的氛圍，自由討論就意味著可以發表任何相左並互相反對的意見，也即培養一種真正的民主意識。實際上，時至今日，我們仍然還像當年孫中山所說的那樣：中國人還沒有學會開會。開會的目的就是讓大家發表種種不同意見，而這種種不同的後面，就隱含著種種不同的個人所代表的不同利益，然後大家協商，然後大家還得學會妥協，便是在這眾多的協商與妥協之中，真正的民主意識產生了。這對生活在這塊有著根深蒂固的專制土壤的土地上的我們來說，是極需要下死勁從頭認真地補上的極其重要的一課，否則，中國的現代化無望，中國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無望，中國的真正強大更是天方夜譚！那麼，我們就只能永遠生活在傳統的陰影之下的千年暗室之中，永遠生活在內憂外患之中，然後仍然憑著一股熱血一股熱情，假充愛國假充英雄實則賣國實則狗熊的惡性循環之中，任何的豪言壯語都改變不了鐵一般的科學規律，難道歷史的教訓還不夠深重還不夠慘重的嗎？整整一個世紀，就是這麼個「德先生」和「賽先生」，成了我們中華民族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可望而不可即的無比巨大的肥皂泡！

我們知道，法治是基本條件，民主是基本原則，人權才可能得到真正保障。我們都清楚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所宣佈的：保障人人生而平等以及他們的不可轉讓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成立政府的目的。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所宣稱的：凡權利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因此，我們都非常清楚，有了憲法，不等於就有了憲政。我們也應該清楚，我們的人權假如真的能夠得到有效的尊重與保障，首先我們自己就應該學會守法，而且必須是上下左右都學會守法，任何單方面地要求守法最終導致的都是沒有法。假如沒有法，我們就基本失去了民主的條件。這一點，擺在我們中國人面前的困難更是無比巨大，而且差不多是從根兒上杜絕了民主的可能——《野草先鋒網》發表的一篇題為《中國現在是個人們都在逃離的社會》的吳思的文章，對此有著十分精闢的分析，有興趣

的讀者可參閱。

那麼，第四媒體營造的公共空間，除了能夠有效地培養我們自己的民主意識以外，如上所述的網絡導致的公共領域的勃興，是否可能進一步營造出我們大家從上到下的學會守法呢？筆者以為：答案是肯定的。關於這個問題，何盈先生有篇題為《互聯網，作為公共領域勃興的契機》的文章，對此有過專門的論述和深入淺出的梳理，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世紀中國》、《公法評論》等著名學術網站均有發佈的何先生的這篇文章，在此就不再重復討論了。

三 網絡載體與知識運作的可能性

頗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學人在網上特別喜歡談論知識份子問題，尤其是何為知識份子的問題的討論與關注特別熱鬧。毋庸諱言，一個不尊重知識甚至鄙視知識份子的民族，肯定是個病態虛弱的民族，甚至是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也毋庸諱言：我們就曾經是一個這樣的民族。便是由於此，我們的知識和知識份子便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民族的一個非常特殊而又無比嚴重複雜的問題。大家對「士」的問題差不多基本已形成了共識，即：士不能也不可能是知識份子。比較多數熱衷探討的是葛蘭西的傳統知識份子與有機知識份子的區分。怎麼看也怎麼不對勁，無論是從學理上還是從現實狀況中，傳統意義上我們充斥的大多只是文人而已，五四極短暫時期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隨著投身革命之後思想改造之後反右文革，知識份子緊跟著又被消滅，即便是有機的說法也對不上，所謂「技術官僚」云云，在我們的眾多潛規則的特殊語境之中根本也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得以存在，不管在哪個領域：只不過是附在一張張不同的皮上的毛而已。既無獨立之精神，更少有自由之思想。只有到了9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理論回潮並進行有效的演進，知識份子群體的面貌才不再像往日那樣模糊不清，他們的言說與知識追求終於開始慢慢回歸到了知識份子本身。在眾多討論知識和知識份子的文章中，原載《天涯》後由《世紀中國》、《當代文化研究》等網站分別轉載的張汝倫的一篇文章引起我的特別注意：他不僅探討了知識份子在不同國度的不同地位，以及不同定位，甚至不同理解，當然，他也探討了葛蘭西的知識份子概念，探討了我們自己傳統意義上的知識份子問題，也探討了殷海光意義上的知識份子概念並指出：我們幾千年傳統中，只有李贄一人堪稱知識份子。最值得重視的是張汝倫把知識份子跟現代性的發生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從而知識份子的面貌和精神就十分立體而全面地被揭示了出來。緊跟著，張汝倫指出了一個讓人特別沮喪而又直指中國知識份子的要害的基本事實：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沒有一個像西方啟蒙思想家那樣能夠提供出百科全書式知識體系的知識份子。

然後就跟上海的另外幾個年輕學人的說法——中國思想失敗了——呼應上了。

我想他們是對的。但是我以為只對了一半。另外一半最近《學術批評網》發的一篇文章《中國為甚麼沒有思想家？》我以為是作了比較充分有力的回答的。首先我們應該問的是：我們自身這樣的社會意識和社會體制長此以往根本不支援也不可能支援，又哪來的真正可能具有創造性的思想學術？我們大家都熟悉著一個現成的諺語：天上不會掉餡餅！我們的知識份子長期以來充當的大都是無根的飄萍，他們的生存長期被控制，他們的意志也就非常自然地要受控制，險惡的生存環境，加上根深蒂固的種種潛話語與潛規則，虛假的學術思想的造假，就成為了必然，因為不虛假不造假就意味著沒有教授當不能當博導沒有大房子住更不可能有小汽車配備。對這所有種種，楊玉聖教授本人所從事的學術批評研究以及他所主持的《學術批評網》，都有著讓人肅然起敬而又觸目驚心的揭示和堅決嚴謹的批評和批判，其對學術規

範的匡正乃至高校改革的健康演進等等，其在中國的學術思想史上都將會留下濃墨重彩的極其重要的一筆。有興趣的讀者可隨時打開《學術批評網》對照閱讀。

無須諱言，網絡的出現讓我們學術的研究景觀為之大變。除了《學術批評網》對學術研究所作的有效批評、監督乃至制衡等等特別重要的貢獻，眾多學術網站的出現有效地改變了我們千人一面的學術期刊的那種沈悶呆板空洞無物的無所作為的局面，更是對那種越是基層邊緣越是往「核心期刊」擠佔以顯示身份的無聊學術乃至不學無術的特別強而有力的反撥。就像網絡的出現是對現存文學舊體制與舊秩序有效的斷裂一樣，思想學術也獲得了空前獨立的品格和相應的自由表達空間。

我們知道，所謂思想學術是成功是失敗，關鍵要看我們是否真正建立起來了知識信仰和科學精神？缺失了這樣的起碼前提，談論任何成功或者失敗，都是無關痛癢的。缺失了這兩樣東西，我們無論在哪個領域都是腐朽不堪，最為嚴峻的是現在的國際局勢：如果我們這個民族是真正強大的，那麼我們的綜合國力當然也包括軍事實力，都不至於像眼下這樣只能以「忍讓」為先。我們也知道，知識信仰與科學精神不是一天兩天就可以培養起來的，從根本上說，我們從來缺乏的就是這個傳統，然後我們時至今日還不想從制度的層面上去做有效的保障。假如能夠在制度層面上得以保障，我們就能創造新的傳統，假如不能在制度上得以保障，我們就永遠是實用主義者，我們永遠能做的只有急就章與臨時抱佛腳，永遠也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和精神，那麼我們這個民族的不發達不強大，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也只有有良好的知識制度的保障和迴圈之下，原創性才是可能的。恐怕誰都知道，知識需要積累，知識也需要傳承，然後才能厚積薄發。不說西方的古希臘、希伯來的「兩希」傳統，光是自由主義傳統就是好幾個百年，然後才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才有技術革命、思想革命、乃至社會革命等等，我們的傳統呢？兩千年差不多就是飽讀了詩書之後最大的理想就是在官場裡混個一官半職，也便是這個傳統才徹底毀掉了我們建立知識信仰與科學精神的可能。因此強求我們的哪個知識份子能夠提供出甚麼百科全書式的知識體系，不說其是揪著自己的頭髮上天，起碼也缺乏我們傳統現實性的根據。無論何時何地，任何一個知識發達文化昌盛的現實景觀，絕不是也絕不可能是一枝獨秀，而肯定是群星璀璨，長江一浪推前浪的。要我說，這就是知識的傳統在起作用。更何況，現代性的道路我們一開始就完全走向了反面，知識被長期貶入冷宮，知識份子遭到了史無前例的摧殘，我們至今記憶猶新——這樣，跟現代性的理念與內涵緊緊捆綁在一起的知識份子，究竟如何可能提供得出哪怕丁點的知識信仰？更不用說甚麼知識體系了。再看看我們從中央到地方的幾乎所有的學術期刊，一副面孔的背後隱藏著的是巨大的格式化思維，你想發表文章嗎？首先你必須經過格式化，好了，原創性也罷創造性也好，全部只能化作烏有與泡影。因此，假如不能從知識制度上入手，任何的求全責備在我看來均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即便是有了良好的知識制度保障和迴圈了，知識的品格還需要頗長一段時間的培養。比較現實的做法，竊以為只能由一撥撥的知識人從不同的知識領域出發，通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努力，慢慢地去共同建構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理性主義現代性知識與體系，才可望塑造出全新的一代國民精神，或者至少是影響。用當代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李慎之的話說是：重新回到五四啟蒙。因為：我們的啟蒙任務不僅遠未完成，甚至可以說現代性的問題發生了沒有在我們這裡都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然而，啟蒙必須要有道具，要有載體，傳統媒介的知識生產與流通基本被壟斷了，被控制的知識生產當然生產不出真正的知識。除了類似《南方周末》這樣極為稀有的報刊之外，客觀地說，幾乎就沒有丁點轉向的可能。

好在現在有了網絡，知識的轉向確確實實在轉眼之間就發生了的。也就是說，網絡成了承載新一代啟蒙的最佳載體。無論是《學術批評網》、《世紀中國》、《學說連線》、《犀銳新文化》、《中國學術城》、《朝聖山之思》，還是《劍虹評論網》、《公法評論》、《憲政論衡》、《法律思想網》、《中評網》、《思想評論》、《燕南評論》、《當代文化研究》，等等（甚至更多，不一一列舉），雖然各家各有側重，卻是均從各自不同角度、側面乃至學科進行著前所少有的理性主義現代性的全面言說，其涉及歷史哲學、政治哲學、語言哲學、現象學、自由主義理論、法學、社會學、社會理論、經濟學、經濟理論以及文化理論、藝術理論……等等，不一而足。其最根本的突破在於，專心於學術與關心社會現實在這裡得到了有機的統一。一如某外國的法學家所說：「為了真正的實用，法學不可局限在實踐問題上」。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只會關心於種種所謂學理，卻又不能對理論本身作有效的實踐性的理解，從根本上說也就是對理論的背叛，從根本上說也就只能是虛假的學術。比如我們現在鋪天蓋地的所謂「文化研究」，便是如此。更不用說長期被所謂「核心期刊」培養出來的學術懶漢，他們的「學術」除了用來獲取利益功名，就既無學理上的真正價值，更沒有任何的現實實踐意義。因此我們的學人既要不斷地深入社會，又要不斷地回到書齋，才有資格談我們自己的原創性。所謂原創性的首要之義，便是要忠實於個體的邏輯認知，因我們常常缺失了這個前提，也就難怪有年輕的學人們所不太客氣地指出的那樣：中國思想失敗了！

然而，現在打開上述的那些著名或者比較著名的學術網站，我們就能不時地感受到一陣一陣清新的學術空氣撲面而來。還不僅僅如此，學術網站在促使知識轉型的同時，也在為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做著有效的知識準備。無論是知識轉型還是社會轉型，均是無比複雜的工程，任何的簡單易行或者僅僅是書生意氣，或者僅僅是一種政治選擇然後推動，歷史事實的情形的是：不但轉型的問題始終無法完成，而且在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過程當中進一步退五步，然後只能歸之於失敗。嚴復老先生早在百年前顯然就已發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當中存在著的這個嚴重問題，他曾經就頗為生動地舉例說：中國人是一頭牛，看到馬跑得快，就想著把馬蹄裝到自己的牛腿上來，然後發現馬蹄裝在牛腿上仍然跑不快，於是發現馬蹄需要馬的骨骼的撐持；接著發現，馬的骨骼裝過來了牛還是跑快不起來，這是因為馬的骨骼還需要馬的肌肉繃住，而馬的肌肉又需要馬的神經系統佈防，直到後來人們終於發現，除非這頭牛整個變成了那匹馬，否則它根本就不可能跑得快起來……剛剛過去的百年現代化進程，非常不幸地基本就是這麼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過程。因此在我看來，今天宣稱這個失敗了那個失敗了的人，基本也就是那樣站著說話不要疼！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有著這麼多的素質很成問題的人口，還有那麼多那麼悠久而沈重的歷史文化包袱，更有那韌性無比根深蒂固再生能力極強的潛話語與潛規則，任何的理性精神與科學之光碰到了它們就如同進入了黑暗的隧道，連閃都不打一個。更不用提我們慣常大眾特別喜歡的訴諸民族主義的做法，在那群情激蕩之中在那激情滿懷之中再複雜再艱難的國家難題都會在瞬間被簡單化，被虛無化了。要說中國的現代思想失敗了，就是在這裡失敗了的。

中國古代思想產生了我們輝煌無比的漢帝國傳統文明，但其骨子裡的專制文化傳統是怎麼也不可能產生出科學與民主這樣的現代化知識與譜系來的。這一點無論是顧准還是李慎之，已經替我們看的是夠清楚明白的了。

但，我們終究是牛，牛不可能變成馬。因此我們仍然還得回到我們自己身上來找問題。眾多的學術網站可以說在這方面做出的努力尤其巨大，他們不僅探討了馬的蹄馬的骨骼馬的肌肉馬的神經當然還有馬的血液，他們還探討了汽車、飛機、衛星，由它們所發佈的資訊可以說紛繁複雜到了一般人難以處理和消化的程度，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們紛

紛意識到了：我們仍然是牛，但我們為甚麼不可以把馬、把汽車、把飛機等等引進來，然後牛也就可以慢慢跟上來了。這就是特別重要的眾多學人的對制度引進的重視，同時也並未忽略了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特別突出的有賀衛方始終關注的我們這塊土地上的具體法治以及應當形成怎樣的法治傳統，有秋風的對憲政理論與超驗思維的深入研究與方法論思考，有朱學勤的關於制度引進與文化傳統的交叉思考，以及吳思的別具匠心的帶有經濟學意義上對種種「潛規則」的成本計算，等等，無不從方方面面切入了我們本土現實的根本。中國現代思想假如不能或者不是一次次有效地重新面對我們這塊古老的土地，假如關心的不是我們這塊土地究竟該當如何真正進入現代性轉型，失敗的命運仍然難免，也包括似乎特別有勇氣地指出其失敗的人自己。任何的急功近利以及貌似宏大而高深並指望一家一派的學說就能完成，不僅輕佻，而且可笑，而且簡直是虛妄！

網絡的理性主義現代性言說已經蔚然成風，儘管我們能不時地看到「此頁無法顯示」或者今天這個網站莫名地倒掉明天那個網站又接著開張。畢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們眾多的知識份子的個體性畢竟在紛紛覺醒：有了這一點，就成了我們本土現代性實現的基本前提和可能了。

相形之下，審美主義現代性問題在網絡當中的表現，顯然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審美主義現代性，從根本的意義上說是反西方意義上的理性主義的，主要表現即為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審美與審醜。在我們本土意義上，個體生命的張揚，除了顛覆覆蓋在我們自己身上的可怕的專制文化傳統，以及由此造成的處處被控制的生存境況，與後現代意義上的非理性主義有著必然和必要的交叉，而批判理性，說白了，就跟我們曾經有過的批判資產階級和批判民主一樣，我們根本就沒有這個資格。我們既沒有真正搞清楚甚麼是資產階級也沒有搞清楚甚麼是民主，我們本土從來就沒有這些個東西，我們就一個個地義憤填膺地批判上了。這個慘重的歷史教訓不能說不深刻，也不能說不可怕。更不用說理性主義的東西，更是我們本土幾千年稀缺的精神資源。從我個人的上網經驗來說，我非常理解並支援年輕人們的那種反權威、反舊體制、反舊文學秩序，也非常贊成他們的常常是非結構性敘事以及遊戲美學：不太關心價值判斷，也不關心真實性如何，而真正關心的是有趣或者無趣。即便是網上的木子美現象，如前所述我也可以表示理解。至於網絡是如何可以多功能、多媒體表現，不客氣地說：其多少仍存在有「中體西用」的嫌疑，我不感興趣。又至於網絡是否參與後現代大眾意義上的平面與複製，即丟失了意義也丟失了深度，從消費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它確實有需要批判的部分。但採取西馬立場對大眾文化橫加指責與批判，我卻有所保留，原因在於：我們的世俗化程度、理性化程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們所接受的只不過是波及全球的後現代文化的影響而已，而並非植根於我們本土的所謂消費資本主義。而在這些方面的更集中表現，應該說主要在於影視劇、電腦遊戲以及種種流行的文化品味與時尚，在網絡文學裏面的表現僅僅為皮毛而已，準確說，實際上也體現不出多少青年人的文化傾向。而後者，又恰恰是我們需要身體力行並加以大力提倡和弘揚的。

但不管怎樣，網絡不斷形成的現代性啟蒙與現代性個體言說，當下已然蔚為大觀。在促使我們的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方面，第四媒體的網絡勢必將發揮出無可替代無可比擬的力量和影響，光是其傳播的速度與力度與廣度，也將讓任何的傳統媒體望塵莫及。

那麼，還是讓我們拿出各自的真誠與智慧，來共同營造這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公共空間吧，讓我們為即將出現的這個公共領域的勃興，都盡量力所能及地添磚加瓦吧！

吳勵生 福建省作家協會全省委員，冰心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冰心文學館客座研究員。代表作有：《吳勵生文集長篇小說卷》三卷，批評集《論操作與不可操作》（與葉勤合著）。目前主要從事批評理論研究。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九期 2004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九期（2004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